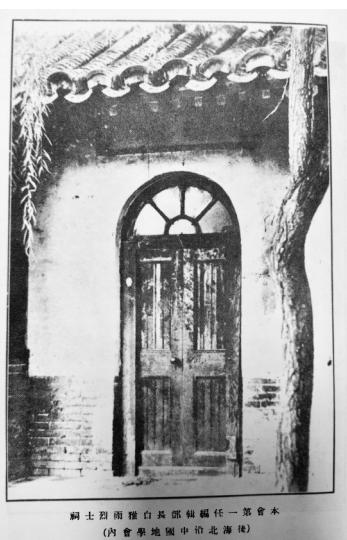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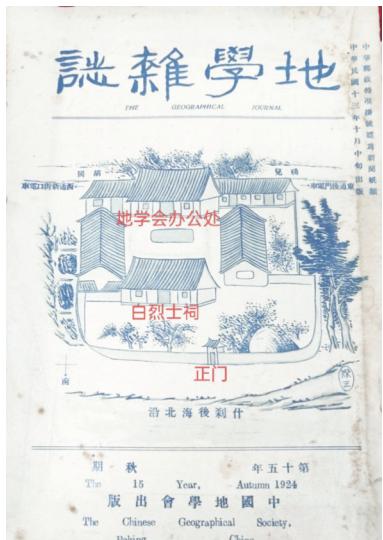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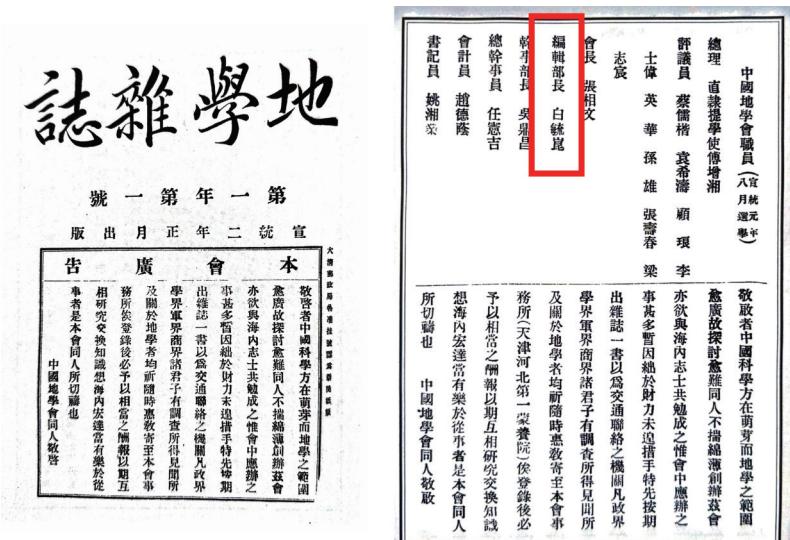


新见史料彰显白雅雨地学救国情怀

□於亮

6月底出差南通,经文友、南通地方史研究者羌松延老师牵线白雅雨的曾孙白维铭,拜访了白雅雨故居。交谈中,我了解到,白烈士故居正在升级改造,故居内的展陈也在有条不紊地对接推进中。因为平时研究张相文的原因,我手头掌握一些白烈士的史料,也是未见公开发表的内容,现整理罗列出来,期待能为丰富白烈士故居布展发挥点小作用。下图左起:1910年《地学杂志》创刊号,1924年秋期《地学杂志》封面,1933年第2期《地学杂志》刊载的白烈士祠大门照片。



■白雅雨在天津任教的登记材料

登记材料有两份,一份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报告,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出版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另一份是己酉冬仲(1909年冬)出版的《北洋师范学堂汇编》。

《直隶教育统计图表》系直隶学务公所编辑,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出版。其中《女学堂简明表》北洋女师范学堂教员一栏载“历史地理,白毓崑,江苏通州,南洋公学校毕业”;《中学堂简明表》北洋客籍学堂教员一栏载“地史,白毓崑,江苏通州震贡”;《专门学堂简明表》北洋法政学堂并无白毓崑的记载。

我收藏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共3册,其中1908年出版的1907年《统计图表》中记载了各学校管理层的人员信息,例如张相文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教务长登记在册,而他作为教员兼课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则未登记,但是通过190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傅增湘签发的学生毕业文凭上地理教师有张相文姓名。1910年出版的显示1909年情况的《统计图表》则仅有图表,没有人员信息。

上述资料清楚表明,白雅雨于1908年到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客籍学堂任教。据2002年3月出版的《天津教育史(上卷)》介绍,1910年12月,北洋客籍学堂并入南开中学,与该校毗连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奉命迁入,校址为今天津美术学院处。1912年春,北洋女师范学堂更名为北洋女师范学校,8月张相文任校长。1913年8月,张相文曾任教务长的北洋高等女学堂也并入该校,作为北洋女师的附属女子中学。1916年,该校奉令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即今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北洋师范学堂汇编》出版于己酉冬仲(1909年冬),在堂教员中有白玉崑(即白毓崑)、张相文等28人。

其中白玉崑任职为“专科中地讲员”,籍贯为“江苏元和县”,出身为“南洋公学师范毕业”,经历为“前充南洋公学历史地理教员,河南文修小学堂堂长,上海澄衷中学堂地理教员”,到堂时间为“宣统元年正月”即1909年2月。据宣统元年《直隶教育统计图表》中《直隶师范学堂简明表》所载,1909年全校共有教职员42人,其中职员14人,教员28人,教员中,白雅雨、张相文等15人接受过近代高等教育。

1911年,北洋师范学堂被撤销,改建天津直隶高等商业学堂,后经过多次改拆并,改名为河北法商学院,1949年,天津解放后,该校撤销。

白雅雨在北洋法政学堂教学经历没有明文记载,根据推断,其在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时间最早也要在1909年正月以后。

■宣统元年天津《大公报》报道两则

天津《大公报》对白雅雨最早的记载是在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都与其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有关。

第一则是宣统元年八月初九(1909年9月22日),白雅雨、张相文等27人在天津《大公报》第6版发布专件《地学协会启》,发起成立地学协会。

在这篇启事中写道:“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同志,抚邱墓之墟,陟陵之祸,果有热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

启事之后附了《地学协会》暂定简章,开宗明义地表明地学会以研究地学为宗旨,也开启了白雅雨、张相文等人

地学救国的序幕。

第二则是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1909年9月30日),天津《大公报》第3版,报道中国地学会成立,张相文当选会长,白雅雨当选编辑部长的本埠《开会纪闻》。

1909年9月28日,农历中秋节,张相文和白雅雨联络傅增湘、袁希涛、英敛之、张伯苓等天津教育界精英,于当日下午二时,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地学协会初次大会,成立中国地学会,张相文当选会长,白雅雨当选编辑部长。中国地学会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3个科学团体之一。

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学术期刊《地学杂志》,为地理学、地质学及地理历史学者提供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的平台,也是清末民初中国科学杂志的代表与旗帜。截至1937年,杂志共刊印181期,刊载论文1545篇,其中,作为编辑部长的白雅雨共编辑18期。

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第1期刊登了《中国地学会启》,这篇文章系1909年9月22日那篇刊载在《大公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启的转载。在当时,公开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团体,中国地学会算是第一个。在张相文、白雅雨等人的带领下,中国地学会“愿馨香顶礼以迎之”,以复兴民族文化、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为己任。张相文、白雅雨等地学救国情怀在这篇文章中得以完整体现,在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全部181期《地学杂志》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一根鲜艳的红线,贯穿始终。

■中国地学会北京新会址白烈士祠图片

1912年初,白雅雨参加滦州起义被俘就义,张相文痛惜万分,亲自撰写《编辑部长滦州殉难白烈士小传》,刊登在当年第一期《地学杂志》上,向世人介绍这在当时的白烈士祠。

位同盟会的会友、亲如手足的挚友、矢志反清的战友。

1923年3月,张相文在北京多方募捐,购得什刹后海北沿11号作为中国地学会新会址,将前厅三楹改作白雅雨烈士祠堂,请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题额。在白祠刻石以记事,一为其本人所撰写的《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另一为陶懋立所撰《白烈士祠堂记》,书作者为书法家张伯英。《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碑文被收入张相文的文集《南园丛稿》,原碑残石被收藏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白烈士祠堂记》原碑去向不明,碑文刊载在1993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的《白雅雨》一书中。

1923年第五、六合期《地学杂志》本会纪事二记载了新建白祠的经历:本会于新置会所内,建白烈士雅雨祠宇三楹。烈士夙擅地史学,为本会创办人之一,任编辑部长,著述宏富。迨武昌起义,结合滦军响应,战败殉难。倾由其当年同志冯桂芬使奏章呈请,明令优恤,追赠上校。本会同人,感其劳绩,钦其伟烈,故于会内设祠,永志景仰,祠额亦冯公亲题。

1924年秋期《地学杂志》封面图系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的鸟瞰图,标明了地学会新置会所的位置,南为什刹后海北沿,北靠鸽儿胡同,东通后门电车,西接新街口电车,直观地反映了正门、白祠、办公处的位置布局。该期杂志还公布了地学会的账目报告,翻建白祠耗三百二十圆三角二分,本会建碑耗一百六十元正,其中张会长(相文)捐翻造白祠洋一百元正。

1933年1月,张相文逝世。当年第2期《地学杂志》为张相文逝世专号,刊载了包含白祠在内的中国地学会会所的主要建筑,让我们能够看到早已不复存在的白烈士祠。

柳诒徵赞誉赵曾望书法印作

□白飞

赵宗朴自幼寓居如东。他生于金石世家。镇江同乡好友、著名史学家柳诒徵不仅在诗中点评赵家三代人的篆刻技艺,还有专文论述赵曾望、赵宗朴父子的印谱。他为赵曾望(字芍亭)写下《赵芍亭印谱·序》:摹印之体,肇自嬴秦,西京缕铜,厥制炳焉。技仅虫雕,文则虎变。穆若觴鼎,珍于琼璋。动刀甚微,如斗斯大。年祀愈邈,矩矱益尊。元明以来,易金以石,远宗猎碣,盛饰越章,妙削山骨,式腾天趣。寻丈之势,郁乎寸心。阴阳之微,以篆指名,家代作派,谱牒斯繁。芍亭先生早攻六书,精研五雅,值值作画,铿铿说经。闲作印人,盖其余事,粹兴削鑿,惊犹鬼神。大马捶钩,不失毫发。压纸山立,触时云腾。弟畜怀宁,几视浙水。曩过蜀琴,叩其庭弦,获睹瑰制,窃仪古怀。

柳诒徵短序简述印史,赞誉赵曾望的书法印作。末了诸句,由己及彼,“弟畜怀宁”是柳诒徵自言私淑邓怀宁(邓石如),学习书法。“儿视浙水”说明赵宗朴篆刻为浙派风格。末句记述柳诒徵往日交游,探问赵宗朴的家学,获机看到他的篆刻作品,心仪他的印作,颇具古风。

柳诒徵自署“盈山齋”,又为赵宗朴写下《海庵印序·序》:芍亭世丈,以秦权汉碑额法印刻。蜀琴承家学,蔚然堂构矣。比又益以安阳甲骨笔执,所造益邃。文郎才舞象匀,日翫花乳,与乃翁抗行。蜀琴殆印人文中王乎?壬申秋蜀琴以印谱属题,谨志数语,备印史世家言:蜀琴当为之轩鼎天乐也。

这篇短序分析赵宗朴秉承家学,擅长篆刻,父子颉颃。相比“印人中王”的主观比喻,对于赵氏父子的篆刻风格作出客观评价。东皋印派兴盛于清初,式微于晚清。浙派于清中期崛起,经久不衰。赵曾望、赵宗朴久居皋东,结识东皋印人,阅览东皋印谱,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篆刻风格的确如柳诒徵所述,与时俱进,更近浙派,师法秦汉碑印,受到东皋印派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妨举印为证。

赵宗朴数次为柳诒徵治印。郑逸梅述及,赵宗朴为柳先生刻有一方“一生书里活”,柳氏特别欢喜,可惜今已难见。幸运的是,《海庵印稿》中录入另外四方印刻,兹述如下。朱文印“翼谋”学习吴昌硕中年篆刻风格,可线条羸弱,且布局上略具东皋印风,字字不搭边,字字不连线,彰显空灵。“盈山齋”也为朱文印。南京国学图书馆前身——江南图书馆位于盈山下。柳诒徵在此支持工作多年,故有此号,并著《盈山案牍》。这方朱文印为“二一”布局,师法秦古印,以金文入印,用刀受到新浙派(王福庵)影响,线条起伏变化。“劬堂”为细白文印,用刀取法汉玉印,字法具有明人气息,线条典雅,印面清秀,堪称佳作。“陶风楼收藏书画之印”白文多字印,布局线条师法汉玉印,用字自吴让之,尚不到位,略显轻率。

综上,以柳氏点评为理论依据,结合赵氏父子生活履历,赵曾望、赵宗朴印作特征的形成,见微知著:清末民国时期东皋印派衰落,浙派兴起,已是事实无疑。

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场范公堤走向图



如东马塘严家墩初探

□陈新华

在如东马塘镇南的老严墩村,飞跃河北岸屹立着一个大土墩,当地居民习惯称其为“严家墩”,普遍观点认为它是古代潮墩遗址。经深研史料与实地对比,推断此处应为马塘场范公堤上的烟墩。

范公堤是江淮海防体系的重要历史见证。北宋时期,范仲淹在担任西溪盐仓监时主持修筑此堤用以抵御海潮,当地百姓为表敬意,将其称为范公堤。后来,范公堤逐渐崩塌损坏,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巡盐御史雍泰又主持进行了重修。

在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所载的“掘港场图”与“马塘场图”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古堤的模样。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开始,向东环绕,折向西南至运盐河位置结束。

那么,结合现今位置,我们来理一下范公堤的具体走向。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的海堤是这样说的:“其海防,曰范堤,起彭家缺,抵运盐河口。”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古墩,沿东南方向经掘港东,折向西南经今马塘南的胜利街(花市街)延伸至西边的运盐河口(现九圩港东的高桥二组附近),在胜利街段呈现东西走向的特征,当地老人回忆,该堤位置过去称挡水坝,坝外就是海。

老严墩村的这座“严家墩”土墩遗址,就在胜利街向西到运盐河口的位置上。从历史文献来看,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载:“其河渠,曰运盐河,发于丁堰……人于掘港……折而东南,为东运盐河,达于仓(东便仓,西便仓)”,指出在马塘东有一条南北向的东运盐河。再结合民国十六年的地图上马塘南有“盐河高桥”的地名,“盐河高桥”东侧有“严家墩”的地名。可以判断严家墩西侧的“盐河高桥”,即指东运盐河上的高桥,正是马塘公堤的西顶点坐标,严家墩就在东运盐河东首。而且,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场图”上明确标注了“范公堤上置烟墩二”的建制特征,严家墩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中记载的范公堤走向完全吻合,此墩处于运盐河口处附近,经实地勘查与文献互证,可判定该遗址实为明代马塘场范公堤上西侧靠近盐河口的墩,实际为海防体系中的烟墩遗址。

这类军事设施在明清海防文献中多有记载,主要承担沿海烽燧报警功能,其建筑形制与普通潮墩存在显著差异。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马塘场并入石港场烟墩一座,表明清末时期马塘场海水不进,烟墩裁为一座,也必定就是严家墩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严墩”地名的语源流变具有典型的地方志研究价值。从音韵学角度考察,“严”与“烟”在江淮官话中存在音近现象,符合地方口传系统中常见的历史地名讹化规律。结合该区域自明中期以来历经多次海岸线变迁与移民迁徙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断“严墩”称谓应实为“烟墩”在数百年语言流变过程中形成的转音现象。这一发现不仅为厘清范公堤沿线军事设施分布提供了新线索,更揭示了地方志研究中语音学考据的重要价值。

道歉信

2025年8月21日,《南通日报》第三版“城市记忆”刊登的《麦文果抗战中在南通救助难民伤员》一文,系陶建明(笔名施一鸣)剽窃朱江《麦文果》(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朱江《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中国档案》2009年第7期),特此向朱江和广大读者表示最大歉意。

陶建明 2025年8月21日

台胞的如皋抗日记忆:故土难忘话烽烟

□朱霖云



陈吉哉血写抗日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如皋民众和全国民众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据刘为先《陈吉哉血写反日旗》一文记载,“九一八”九天后的9月27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如皋各界反日救国会,有两万人参加,声讨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

在党政首领、各界代表发言后,“从台下的人群中,走出了在教育局担任缮写工作的陈吉哉,他昂首阔步地登上了主席台。”与会民众见一位普通的机关职员,不经大会主持宣布,径直主动登台,惊奇不已,全场一片寂静,注视着他的动态。“只见陈吉哉把杀倭成仁的英雄的牌位带到主席台中央,向牌位行礼”,之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激起全场共鸣。他一边演说,一边从口袋掏出纸笔和小刀,“用小刀把手指割得鲜血淋漓,拿笔蘸着鲜血在四开大的白纸上写上‘誓死反日’。”场上“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响彻云霄。

他把血书做成旗帜,高举着血光闪耀的四个大字,参加群众游行,游遍如城四门,口号声震撼全城,激起全如皋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以后,陈吉哉倡议募集集国基金,担任负责人,把如皋人民捐献的救国基金“寄给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和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将军”。并用其中一部分资金,把位于体育场旁的纪念抗倭英雄的邱公祠修葺一新。

三同学投笔赴前线
广谷的《如皋师范学生抗日运动的回忆》写道:“九一八”事变后,如皋师范的学生和全国人民,和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一样,众志成城,热血沸腾。其中如师学生“崔伟生、谢春生、徐开儒三人,情绪尤为激昂,要求到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部参加抗日杀敌。这时如师全体师生,都一致拥护这三位同学的壮举,并派出学生赴各区募捐,支持他们三人赴东北抗日前线救国。”当时作者广谷分到磨头区募捐,区长朱安晋很热心,不但自己带头捐款,还招待学生住宿。学生们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当地百姓非常愤恨,纷纷捐款,一位60多岁的老人,跑了3里多路,把一块银圆送到学生手里。

众难归葬马塘墓
官府的《乙冬皋旅沪难归葬马塘公墓》回忆说,抗战初期马塘西郊有一座公墓,牌坊刻书“万骨同归公墓,千秋永作义山”,墓中安放近百口棺柩,俱为“八一三”事变中罹难的如皋同胞。

1937年距卢沟桥事变仅36天,日军又于“八一三”大举侵犯上海。恃其空中优势,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狂轰滥炸,这些地区陷入一片火海。平民罹难甚多,如皋旅沪谋生的同乡,很多死于非命。

如皋旅沪同乡会激于民族义愤和同胞情深,于抗敌烽火中首倡义举,在马塘建立公墓,让遇难同胞得以归葬。工商界一呼百应,踊跃捐资,先买棺收敛,暂厝沪上。同年底,在马塘西三里墩购得义地20余亩建墓,并树坊筑亭。尔后雇船从上海将90余口棺柩运回安葬,以慰亡灵,安抚遗属,不忘国仇家恨。

为抗日不计私怨

季耀的文章《二哥与我》忆述了国难当头时,季恺一心共同抗日、不计私仇的往事。

季耀出生不久,其父母迷信,为避祸病,将其过继给伯父、季恺父亲为干